

贵州新文学大系

诗歌卷

1919—1989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 州 新 文 学 大 系

(1919——1989)

诗 歌 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新文学大系

诗歌卷

责任编辑：龙国义
装帧设计：石俊生
版式设计：邹刚 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 话：(0851)6828570
社 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码：550004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352千字
印 张：14.375
版 次：199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7-221-04048-6/I·886
定 价：23.50元

《贵州新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寒先艾 龙志毅 黄 瑶

主 编:

胡维汉 张 克 卢惠龙

执行主编:

尹伯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王良范	王鸿儒	尹伯生	井绪东
艾筑生	卢惠龙	朱吉成	何士光	何光渝
何积全	余未人	陈锐锋	张 克	张 劲
张 Jian 建	周飞燕	杨胜利	胡维汉	夏 凡
徐 达	莫贵阳	秦家伦	鲁令子	彭晓勇
戴明贤				

总 纂:

尹伯生 井绪东 秦家伦

引 言

尹伯生

从1988年倡议编写本书到现在全部定稿,前后有八个年头了。前四年多时间,主要进行各方面的筹备工作:诸如选聘编写人员,研讨修订编写提纲,以及筹措经费、协商出版事宜等。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协调和解释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即对贵州文学七十年实绩如何认识?对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的意义和价值作何估计?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贵州文学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长期以来又少有在全国知名度高的作家,和有广泛文学影响的优秀作品。诚然,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是有先进滞后之别的,但这抹煞不了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的客观存在和它自身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历史。我们从史料中发现,早在三十年代也曾经有过诸如“贵州无文学”之类的妄语见诸报端。这显然是对贵州历史无知的一种自卑心理。事实上贵州文学的历史绝非一片空白。这里对明代的孙应鳌、清初的周渔璜等姑且不论,而清代道光以后出现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诸家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曾在全国名噪一时;而在抗战时期,除了众所周知的由于众多国内文化名人旅居贵阳而一度呈现的文化繁荣景象,却往往忽略了与此同时,在旅外归来的蹇先艾、谢六逸等的积极倡导推动下,贵州本土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极为活跃,并且涌现出了大批青年文学作者,形成了贵州本土文学的发展繁荣局面;及至八十年代在全国产生了影响的贵州文学新崛起,这些都是贵州文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尊重贵州文学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

是地肯定贵州文学的历史实绩,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有利于促进贵州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当是毋庸置疑的。

从而,我们把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的目的和任务确定为:展示贵州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为研究和促进贵州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做一点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

《贵州新文学大系》有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体相同的格局:按文学门类分卷,每卷包括一篇概论性文章和该文学门类的作品选。但本书又有它自身的特点:由于本书所包容的时间跨度长,即从1919—1989年。在漫长的七十年中,各门类文学当有符合自己特点的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求各卷的概论性文章采取似史非史,史论合一方式,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观点,展示不同历史阶段各文学门类的面貌,分析各门类文学的创作发展特征,评介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各卷作品选的入选标准,当然首要是“择优”,但同时也强调注意“择要”。由于“择优”和“择要”两者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入选作品主要是不同发展阶段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之作,但就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看,就不见得是他的最佳作品;还有某些作品则主要着眼于它在不同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入选,其中大多也是当时的优秀之作;至于少数即便非属上品,但其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价值却也弥可珍贵,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贵州文学七十年间所创作的作品何止万千!各卷作品选的选编诚然主要取决于各位选家的眼光。他们通过广泛搜集,认真研读,缜密思考,最后才遴选出入选作品;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择优”“择要”的入选标准,和“避免因人取文或因人废文”的要求,尤其是严格的篇幅限制,因而各卷作品选虽几经权衡斟酌,某些取舍得失之憾恐仍不能尽免。

在几年的编写实践中,我们逐步明确并适当调整了一些涉及

编写工作的具体问题：

关于资料搜集。从开始筹备工作，我们就登启事，发信函，要求广大作协会员提供个人创作资料，得到多数会员的支持，但由于诸多原因，无法求全。与此同时，各卷分头进行搜集，到有关单位查阅翻检报刊资料，特别是解放前的报刊资料，这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或是没有，就是有也不让翻检，三是好不容易找到有用资料，又不许个人复制……这无疑更增加了搜寻的难度。至于千方百计发掘线索，跟踪追寻，搜求一个不应遗忘的作家，一部曾经产生影响的作品，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们来说就更加难能可贵。本书现代文学部分发掘出一批鲜为人知的作家，和长期被湮没的作品，突破了所谓“文革”前贵州没有中篇小说的错误说法，这在文化积累上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尽管编写组同志为了追求翔实资料，抱着强烈的责任心，作了艰苦努力，事实上却仍难求全，只有留待有心的研究者继续搜寻，不断补充。

关于概论性文章。对全书共三十万字的概论性文章，不仅要求通过宏观把握，勾勒出各个时期文学创作面貌，并且要对作品作具体的评价分析。这就面临着对作家、作品，尤其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选择取舍，评介轻重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同时对各阶段文学现象的认识和评估也必然存在见仁见智情况。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失当，本书明确规定不给作家立传，不对作家的整个创作进行总体评价，而只对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品作实事求是的评介。同时决定各卷的概论性文章采取笔者个人署名形式，表明是“一家之言”，从而给进一步研究探讨留下更大余地。

关于作品选。本书包容的时间跨度大，面对的作家作品数量也就相当庞大。在有限的篇幅内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尽可能扩大入选面，除诗歌、杂文等短小作品不限入选件数外，其它作品除了少数重点作家，一般情况是一个入选一件；对一些篇幅过大的作品采取

节选方式；对从事多品种创作，影响较大的作家，应突出他的主要创作品种，对次要品种作必要的取舍。尽管全书作品选近三百万字，入选作品达七百余件，遗漏仍然难免。

关于本书的分卷的体例不一问题。这主要是有的卷所包容的时限不同。当代文学各卷是分别文学门类论评解放后四十年（即1949—1989）的贵州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卷是对解放前三十年（即1919—1949）贵州文学各门类的论评，而文论卷则包容了1919—1989七十年间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评析。

有关入选对象和范围的一些问题。长期在贵州生活工作的外省籍作家，其创作和文学活动对贵州文学有相当影响的应列为本书编选对象；而长期在外省生活的黔籍作家，由于资料搜集困难和篇幅所限，除现代文学卷和文论卷的现代文学部分已收入部分全国著名黔籍作家的作品、文章外，本书当代文学部分均未收列。

鉴于民族民间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都已成立了专门协会，因此，以贵州省作家协会名义组织编写的本书，不再包括民间文学、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

另外，旧体诗词、革命回忆录、作家书简、以及外国文学译著等，主要限于本书的编写条件也暂不列入编选范围。

对于民族文学不列专卷的问题，是必须在这里特别说明的。贵州是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学是贵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贵州文学要在中国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优先发展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本书最初的编写提纲就专列了“民族文学卷”。但后来几经研讨，大家认为，单列虽有利于突出强调民族文学，但同时却割裂并削弱了各卷应有的分量，影响了各文学门类的完整性。因此决定不再单列“民族文学卷”，而在各卷中注意民族文学的比重，强调发展民族文学的重要性。事实表明，解放以来，贵州民族文学一直受到应有重视，得到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尤为迅速。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质量显著提高，在贵州

文学中居于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本书的编写采取个人执笔,集体研讨,反复修改,三级审定这样比较缜密的编审程序。各卷写得认真,改得认真;编纂组和主编审稿会对每部稿子的研讨也很认真。没有一部稿子是一次通过的,有的稿子还作了重大修改。全部书稿改完后再提交编委会全体会议审定。即便如此,疵漏仍在所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现在《贵州新文学大系》全书即将定稿。这是参加编写工作的全体同志几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本书从筹备到编写的整个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和各个方面朋友的关注和支持。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原任省委副书记)就多次参加研讨,对编写工作发表了中肯意见;他还随时过问编写进度,并帮助解决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贵州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张克是一位从本书倡议到编写的热心支持者;现任总编卢惠龙也积极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他们都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省文联党组一直关心本书编写工作,前后两届党组包括省文联主席、前任党组书记胡维汉在内的好几位党组成员直接参加了本书编写工作;现任党组书记杨长槐(原省文联秘书长)从1991年起给予的经费支持,对本书编写工作起到启动作用。

在艰巨的资料搜集工作中,首先要感谢广大作协会员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还要向提供查检报刊资料方便的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遵义图书馆、省文联资料室以及其他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寻找资料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1995年9月

《贵州新文学大系》总目录

引 言	尹伯生
现代文学卷(上)、(下)	
现代文学扫描	
小 说	何积全
作品选(中篇节选 5 部,短篇 32 篇)	
散 文	陈锐锋
作品选(104 篇)	
诗 歌	陈锐锋 何积全
作品选(88 首)	
中长篇小说卷(上)、(下)	
展开人生壮丽的画卷	
——贵州当代中长篇小说论评	王鸿儒
长篇小说列目(34 部)	
长篇小说选介(11 部)	
中篇小说选目(66 部)	
中篇小说作品选(14 部)	
短篇小说卷(上)、(下)	
上编(1949—1978)	
坎坷曲折的辛勤笔耕	何光渝 彭晓勇
作品选(21 篇)	
下编(1979—1989)	
走向现代的艰难掘进	何光渝
作品选(28 篇)	

诗歌卷

重读来路

——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 张 劲

作品选(282 首) 朱吉成

儿童文学卷

从起步到繁荣

——贵州儿童文学发展概述 戴明贤

作品选(94 篇、首) 戴明贤

散文卷

从平淡走向深沉 由单一趋于斑斓

——贵州散文四十年创作史论 艾筑生

作品选(散文 47 篇、杂文 36 篇、报告文学 10 篇)

文论卷

贵州新文学理论七十年 张 建 建 王 良 范

作品选(65 篇)

史料卷

鲁令子 井绪东

贵州新文学大事记(1919—1989)

贵州文化、文学社团

贵州文化、文学期刊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小传

贵州作家创作书目

贵州新文学大系

诗 歌 卷

(1949——1989)

目 次

重读来路

——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 张 劲(1)

诗选目录…………… (48)

诗选…………… 朱吉成(64)

重 读 来 路

——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

张 劲

从1949年到1989年，贵州新诗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漫漫长路。

那句“四十而不惑”的老话，对于一直生活在平稳的传统农业社会里的人来说，或许有相当的可靠性，但对于颠簸在变化激荡的现代社会里的人来说，则未必靠得住。至于贵州当代新诗——这个经由若干诗人积四十年坎坷岁月滋养，并还在继续生长发展的生命活体，就更难以“不惑”二字笼统界定了。原先曾“惑”过我们的，现在我们可能真的“不惑”了，而原先似乎“不惑”的，现在倒真的使我们“惑”起来了。“不惑”，使我们获得了宝贵经验，“惑”，使我们增加了继续探索的动力。

在这“惑”与“不惑”、“不惑”与“惑”之间，让我们重读来路。

一、新路初登曲折多(1949——1966)

1949年11月，贵州全境解放。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手，新的歌手产生于新的时代。贵州当代新诗正是在社会主义土壤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

解放以前，贵州由于地方军阀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地理位置的闭塞、偏远，经济贫穷，文化落后，自“五四”以来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也有一些贵州籍的文化人尝试过新诗创作，但为数既少，且多在外省活动。因此，当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国统区的进步诗人和解放区的诗人两支队伍在北京胜利会师时，贵州还尚无一位略具知名度的新诗诗人，更谈不上已有诗人群体的出现。贵州的诗人队伍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外省先后入黔的一批诗人和由贵州本土陆续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所共同组成。这支诗人队伍经过了整个50年代并加上60年代的前几年，才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曲曲折折地建立起来的。

诗人队伍的建设与诗歌创作的发展，同步行进。

建国之初，万众欢腾。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深刻的历史巨变，使诗人感受到崭新的时代气息，欣欣向荣的社会风尚，同时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形象。正如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所概括的那样：“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

这种“新的歌声”，当时主要是以颂歌的大量出现为标志。赞颂新生的祖国，赞颂党和领袖，赞颂翻了身的人民，赞颂革命先烈，是诗人们的共同主题。在贵州高原，最先唱出这种颂歌的，是钟华、洪茵、唐春芳等新人。

钟华，这位随军南下而进入贵州的诗人、歌词作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天，便按捺不住自己的无限喜悦，写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歌词。歌词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盼解放的急迫心情，庆祝解放的欢腾情景，自豪地宣示了新中国诗人应担负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喊，喊出人民的喜悦，/我们要唱，唱出胜利的骄傲”。当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他又写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歌词。这首词被谱成曲并灌成唱片后，传遍大江南北，

激励着许多热血青年跨过鸭绿江，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尤其是1951年发表的百行以上的长诗《我爱上了这新世界》，借一位83岁的彝族老人之口，唱出了对于旧中国的憎恨，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对于共产党、毛主席、人民解放军的由衷感激：“彝苗受苦几千年，/你打断了年代换了天；/刺芭林中开大道，/你指点我彝苗路一条。”全诗采用平白如话的口语写来，朴实亲切似促膝谈心，这是诗人对民歌风的一次尝试。血泪里挣扎了几千年的贫苦彝民，不但成了政治上的主人，而且也成了文艺的主人，诗人自觉地以其“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采取当时群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写出，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具体实践。这首长诗也是建国初期的贵州诗坛，汉族诗人反映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最先艺术实践。

除钟华外，洪茵1950年至1953年发表的《红旗飘飘进了贵阳城》、《铸字房》、《半边桥》，苗族歌手唐春芳1951年发表的抒情长诗《歌唱恩人毛泽东》，罗马1952年发表的《安营的时光》、《战友情深》，布依族作者弋良俊1953年发表的《婴儿出生在黎明》、《坑道旁的青松》，等等，都是解放初期贵州较早的一批诗作。这些诗作，虽然普遍都有一种“话怎么想就怎么说”，缺乏形象思维和艺术表现的毛病，但都从各自侧面纪录了一个时代的心声。像洪茵的《铸字房》，从一个报纸编辑人员的特定角度，写出了对“人民”的态度：“从前反动派不要人民，/印报纸就不用这些字样。/如今可就不同了，/‘人民’到处放光芒！”“人民”这个字眼，既堂堂正正地写上了共和国的旗号，也深深镌刻在诗人心中。像描述军民并肩作战，歼灭国民党残匪故事的《半边桥》，则是贵州解放初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叙事诗。至于唐春芳发表于《新华日报》的长达200余行的抒情诗《歌唱恩人毛泽东》，则是贵州少数民族作者解放后最早以书面创作形式歌唱领袖、歌唱各民族大团结的自由体新诗；而罗马和弋良俊的一些短诗，则较早反映了军营生活和抗美援朝战争……它

们是 50 年代的贵州诗坛最初留下的足印。

50 年代中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沸腾的现实生活的召唤,使新诗的滋生和发展获得了丰厚的土壤,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在全国形成的新诗创作小高潮,又为贵州诗歌的前行创造了良好的气候。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激发了较早一批诗人的创作欲望,同时更催生了一批新人的成长。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赞颂,对于新的劳动生活的讴歌,对于红军和革命历史传统的缅怀,成为了此时颂歌的另一普遍性主题。

已有较多艺术实践的钟华,1956 年发表了他的侧重于主观情绪抒发、直写胸臆的抒情长诗《乌江歌》。诗人写道:“乌江啊乌江,/吸引着我的/不是你两岸巍峨峭陡的石壁,/也不是你直泻天际像一条银河;/不是你头顶着蓝天像一匹蓝缎拖曳,/也不是飞鸟戏水敛翅直下像织女穿梭,/……”那么吸引着诗人的,是乌江的什么呢?

乌江啊乌江,
吸引着我的
是你那一团团、一团团的浪花,
是你那一个个、一个个的漩涡;
是你那激情的声调,
是你那湍急的节拍;
是你那大无畏的气概,
是你那大无畏的性格;
.....

诗人赞美乌江,也是赞美新生的贵州,赞美新生的中国。乌江那如画的景色、奔腾的气势,与时代豪迈的感情、壮阔的理想,融为一体。诗人回溯历史,欢呼现实,展望未来,在交叉的时空与跳荡的

节奏中，将乌江化为一支“永远唱不完”的“抒情的歌”，“战斗的歌”，“英雄的歌”，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胜利情怀。这首百余行的长诗既汲取了民歌的养料，又发挥了自由诗的长处，同时还接纳了“楼梯式”诗参差错落的某些特点，创造了适合诗情展现的特定形式，是贵州 50 年代诗苑的重要作品之一。著名评论家冯牧同志说，钟华 50 年代“许多以描述和吟咏西南边地生活的作品，不但超越了西南的地域界限，在全国也产生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反响。”（《值得赞美的磨刀石精神》）便是中肯的评价。

吴纯俭，这位 40 年代曾以笔名“采风官”、“吴昉”发表过一些反内战、争民主诗作的诗人，此时也满怀喜悦地唱起了新时代的工业颂。他为西南铁路建设写下了大量反映工地人物、劳动生活的组诗。看他笔下的女工队伍：“这是谁给你取的番号？/取了一个 123 小队。/这又是哪个音乐爱好者？/把你们叫成‘多来米’小队。”“呵！呵！你们可真是这样的一支小队，/每个人都像是一个音键。/只要轻轻地一按，你们都会跳起来，/每个音键呵，都会发出一串美丽的声音。”（《宝成铁路上的女工队》）欢快轻松的笔调中，掩抑不住对于新一代建设者的颂扬。

与此同时，一批朝气蓬勃的新人相继出现，给年轻的贵州诗坛注入了新鲜活力。/张克、廖公弦、廖涛声、张子原、石永言、梅蓊、虻歌、刘大林、朱吉成、叶笛、罗绍书、乔大学、艾莎、王蔚桦、杜若、潘俊龄（苗族）、阮居平等，都纷纷唱出了自己对于新生活的兴奋。他们或描绘山区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新变化，或描述城镇工厂中的新风新貌新气象，或咏赞遵义、娄山等革命遗址，或描写少数民族群众的春种秋收，志愿军战士和边防哨兵的可敬可爱……尽管新人们起点不一，多数人的笔头尚还稚嫩，尽管写诗的热情此时还胜于写诗的才智，急于为生活歌唱的愿望此时还胜于对艺术功力的追求，但是火热的生活推动他们跨入了诗坛，使他们所唱的颂歌和赞歌，成为现实生活所赋予的实感的迸发。因此，田野里劳动的欢